

笔随心动

回家是一种责任

○高继卫

又一季新春渐行渐近，那曲温馨的萨克斯又在耳畔回荡——《回家》。

有人说，回家是一种幸福；有人说，回家是一种感觉；还有人说，回家是一种情怀。我说，回家是一种责任。

前些日子，看芒果台新版《歌手》第二季，第一场竞演压轴曲目是汪峰的《无处安放》。“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，终将这样无处安放……”听到这里，现场不少观众眼眶湿润了。据说，这首歌是汪峰写给妻子章子怡的。在我看来，这首歌也唱出了天下所有父母的心境。除夕的家宴上，如果没

有儿女的陪伴，那颗叮叮当当的心，又该何处安放？

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一直被树为敬业奉献的主流价值观，在对他们的坚守肃然起敬的同时，我在想，有条件的放假的，还是应该把回家这件事装在心里。坚守，是一种责任；回家，同样也是一种责任。因为父母用了360多个日夜的守候，期待着那桌团圆饭上，没有一个空缺的位置。

有时候，常常会产生一种困惑，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。有事没事，发几句语音，开一段视频，与父

母家人见面似乎变成了一件唾手可得的事。于是在心安理得中，习惯了这种“线上回家”的团聚，尽管高速、高铁、自驾车，让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近。

但是，语音听到的，视频看到的，却未必是真实的。那一次，母亲出门崴了脚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连走路都困难，但在视频里，母亲却一直微笑着，微笑着说一切都好。过了很久，才听姐姐说起这事，心头涌起一阵酸楚。我知道，母亲是不想让做儿女的担心，但从那时起，我不再相信语音、视频里听到的、看到的皆大欢喜的声

音和笑脸。

《论语》说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意思是，父母年迈在家，做儿女的尽量不长期在外地。不得已出行，必须告诉父母去哪里，为什么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。如今，现代人力资源的整合早已打破了地域界线，“家乡”两字变得淡漠，异地工作成为常态后“远游”也不再被斥之为不孝。而生活，又需要太多的现实考量。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，各种压力、各种纠结也随之而来，自身的职业规划，孩子的就学求职，居高不下的房价，一日三餐的奔忙

……渐渐地，我们的心里每天揣着这些无法推却的任务清单，似乎已经装不下别的惦念，别的牵挂。我们也忘了自己在经历中年之困的同时，父母已步入晚年，他们正经历着健康之忧，甚至是病痛之苦。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儿女的陪伴，儿女的慰藉，在亲情中感受温暖和力量，就如同我们曾经离不开他们一样。

回家，是这个春节应该做的决定，应该担的责任。循着《回家》的旋律，我似乎闻到了除夕家宴那满满一桌家乡的味道，似乎看到了父母眼角转动着的欣慰的泪光。

情景交融

今夜的雪

○刘汉杰

雪花轻飘
似你身影
只留一阵清香
给爱慕留下无限遐想

谁说相逢不是邂逅梦乡
你一尘不染的纯洁
正是知音听见了抒情弹奏
也许某个音符将你心灵点亮

生命四季浩瀚海洋
谁在碧波中驾驭爱情风帆
快乐水手渔家姑娘
一朵雪花风情万种

我听见了你芳香的呼吸
冰清玉洁
与世无争的性格
比红梅更加悠然



又见断桥残雪

周金友 摄

百姓故事

儿子的储蓄罐

○应红枫

整理儿子的房间，从抽屉里整出一个胖乎乎的小猪储蓄罐。摇一摇，里面“叮铃当啷”的，还有一些硬币。这是儿子读小学的时候爷爷买给他的，儿子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存在储蓄罐里，其中有一元的，五角的，甚至还有一角的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打算把它拿出来，去银行换成整票，儿子却坚决不同意，他要把这些硬币留在储蓄罐里，留做纪念。

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，父亲也送给我一个储蓄罐。那个时候我跟随父母住在舟山的册子小岛上，家里生活拮据，父亲不可能花钱给我去买一个小猪储

蓄罐。不过父亲有一双巧手，给我找来一截矮胖的毛竹根，留出两头竹节，锯掉多余部分，把两头边沿削得溜光圆滑，成为一个竹筒储蓄罐的样子。然后，父亲用木砂纸把表面打磨光滑，在这截竹筒上雕刻了一些竹石花鸟图案，又在竹筒边上锯了一个口子，刚好塞进一枚五分钱硬币的大小。一个简易漂亮的竹筒储蓄罐，就这样做好了。

有了这个漂亮的竹筒储蓄罐，我就把平时舍不得花的零花钱积攒下来，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，塞进储蓄罐里。一次期末考试后，父亲给了我一元钱。我很惊讶，父亲

从来没有这么慷慨过。父亲说，一元钱是几分啊？这还用说，当然是100分呀。父亲说，对了，这是给你考了100分的奖励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崭新的一元纸币折叠成整齐的小方块，也塞进了储蓄罐中。后来每次单元测验或课堂练习我获得满分时，父亲也会给我五角或一角的奖励。渐渐地，那个竹筒储蓄罐里已经挤满了各种面值的硬币纸币，于是父亲想办法帮我取了出来，换成面额稍大的纸币再储存进去。记得我到定海二中上初中时，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，就是用我储蓄罐里积攒下来的零钱交付的。

直到我中学毕业，这个储蓄罐一直跟随在我身边。后来因为参加工作和几次搬家，等我想到再去寻找那个竹筒储蓄罐时，它已不知所踪了。但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一个储蓄罐，我已养成了花钱节俭的习惯，“宁可顿顿缺，不可一顿无”成为了我对生活的认知。

自从儿子有了这个小猪储蓄罐后，他不像以前总是讨零食吃了；有了零花钱，他也喜欢往储蓄罐里塞。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绍兴春游，儿子舍不得买零食，只在绍兴老街鲁迅故居前买了一把有水乡特色的纸折扇回来，把大部分的钱还给了他

妈妈。他妈妈把两张百元大钞收下，把一些零钱交给了儿子，儿子自然又把这些零钱塞到了他的储蓄罐里了。

从小学开始，妻子就培养儿子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，比如安排每天到楼下倒垃圾桶，每次奖励五角钱；自己准备早饭或炒个蛋炒饭什么的，奖励一元钱。儿子吃了自己做的蛋炒饭，拿了妈妈奖励的一元钱，便一蹦一跳地把钱存到小猪储蓄罐里。

小猪储蓄罐里零钱日渐多了起来，儿子也慢慢地成长了起来。储蓄罐里储存的是儿子省下来的零花钱，也储存和传承着我们家节俭的家风。

往事如歌

当年，我这样折腾英语

○王珍

我成绩不好，又不肯高复，想一次性考进大学，所以读了师范外语系。当时的外语老师吴老师是再三让我别去上那学校，对我信心满满：复读一年，我保证你考上“上外”或者“北外”。

但是，我没听老师的话，因为我认为只有坏学生在应该读书时没好好读书才要复读，再说了，我相信“第一次”，不喜欢“一而再”。不过深层次的原因是，如果老师说，我保证你考上复旦中文系。我想，我大概是会心动的。

其实，我从来没有真心地喜欢过外语，上大学时看到中文系的同學读书就等于看小说，而我们外语系的學生却隨身携带大把大把的单词卡片，起早摸黑地读啊背啊，我就恨死了英语。觉得

老外真麻烦，如此美丽的中文他们不用，非要那么费力地弄出些洋洋来，特别是学二外日语时，我感觉实在是太纠结了。那些看似中文的方块字，被日本人理解得莫名其妙，好好的“丈夫”两个字，日本人一定说是“健康”的意思，而“主人”倒是我们中国人的“丈夫”了，难道家中的妻儿老小都成了仆人了？尤其是动词的五段变化简直就是蛮不讲理……

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中学老师，这倒是我从小喜欢的志愿。但这样的志愿是很幼稚的，就是因为小时候上课看小说被袁老师扔过粉笔头（请原谅我这么背后说袁老师，那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老师，对我有恩的人），我想报复，也可以扔学生粉笔头，出点难题给他们考试。所以，我的英语课

我教书时，看着学生们把英语折腾得面目全非我从心里感觉到开心，并崇拜他们的创造力。比如说，他们每天早晨看到我总是很礼貌地说：“踢一脚王，狗得摸脸！（Teacher Wang, Good morning!）”我就装模作样地伸出手抚摸自己的面颊，回答一句：摸脸！摸脸！

教了他们一年后，我也被他们同化得差不多了，习惯了他们这种“中国式英语”的奇特发音。基本上每一个学生的课本都是他们自己编撰的字典——他们用中文给每一个英文单词注释了读音：机器人是“萝卜汤”，蔬菜是“饭吃太饱”，工作是“茭白”，司机是“抓一把”，老师是“踢一脚”……他们每每读到“踢一脚”，我就会装模作样做踢他们的姿势。所以，我的英语课

堂中常常是欢声雷动。他们还常常写好多顺口溜：来是卡门（come），去是狗（go），一块洋钱混大佬（one dollar）。他们说，这样学英语就不会太辛苦了。当然，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他们如此“创作”，所以，常常会告诉他们，这样会学不好英语的。但多半是，我被聪明的学生们说服的。

一次，我教他们读单词“Southern State（南美洲）”，学生一边注上中文：“杀人是对的”，一边还反问我：“杀人是对的？外国佬怎么介反动？”我说，是啊，你们这样折腾英语有点不大好吧。学生想了想问我：“踢一脚王，火烧圆明园是谁干的？”“英法联军啊。”“英法联军是不是有英国人呢？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学英语呢？”

我被问得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气急败坏：你们简直把英语糟蹋成“英国垃圾”了。学生顺水推舟，说我的“英国垃圾（English）”最具创意，从此后他们就叫我“英国垃圾踢一脚”了。

学生们还有远见地告诫我：踢一脚王，英语最终肯定要被中文战胜的，你看我国正式出版的字典上都有词条：拷贝（copy）、坦克（tank）、沙发（sofa）呢，你不如趁早把中文学好，改行做语文老师吧。

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汗颜，自己不喜欢英语不说，这样教下去也是绝对误人子弟的，所以就考进报社去做了编辑、记者。事实上，学生的话确实在被不断证实，新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确实是新增了：粉丝（fans）、做秀（show）等词条。

人间

思想随笔

关于仓鼠的“奔跑”

○卢江良

为了满足孩子养宠物的兴趣，妻子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只仓鼠。由于一贯对蛇、鼠、蛙之类充满莫名的恐惧，那只仓鼠初到我家时，我没有凑上去，只是远远看了一眼——它如小孩拳头般大小，浑身灰不溜秋的。

尽管我不想搭理那只仓鼠，但它的举动还是引起了我的关注。因职业特点所致，我平时睡得较晚，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无论我睡得再怎么晚，鼠笼里的那只滚轮总在不断转动，这也就是说，那只仓鼠整夜都在“奔跑”。

“这只仓鼠怎么回事？整个晚上都在跑步！”我问妻子。

妻子止不住笑我：“你真什么都不懂，仓鼠是夜行动物。”

出于好奇，我上网查了资料，了解到仓鼠非常喜欢运动，如果在家宠养的话，必须给它准备滚轮，否则它的精力无处发泄，搞得不好还会引起瘫痪。就算那些在野外生活的，几乎每天晚上也都会跑几英里的范围寻找食物。

这让我联想到了另一种动物——无脚鸟。记得，在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《阿飞正传》里，有过这般描述：“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呀，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。”

然而，与无脚鸟情况不同，仓鼠可以不那样卖命地“奔跑”——对野外生活的而言，它没必要必须跑上几英里去费劲地寻找食物，完全就可以就近解决；家里宠养的更不用说了，已提供给了它们足够食物，连喝的水都给煮过的。

这么说来，仓鼠的“奔跑”，只是习惯罢了。

不过，有这等习惯的，不光是仓鼠，在人类中也不鲜见。我就认识一个朋

友，他在单位从事研究工作，几乎每天都在加班，并爱在朋友圈津津乐道，自以为对这个社会作了大贡献。但在我看来，这无非是工作效率低下的表现！

还有那么一群写手，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写作，每年发表作品字数可达上百万！这中间的绝大部分，连续二三十年写下来，发表和出版的作品，堆起来足以超过身高，可谓“著作等身”了！但遗憾的是，没一篇作品能深入人心。

那跟仓鼠的“奔跑”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但话说回来，仓鼠的“奔跑”，毕竟没多大危害——生活在野外的，耗费的是它自己的体力，这是它咎由自取，我们也不管不着；宠养在家里的，也只是发出些噪声——对此我们将其置于卧室外便好，另外也就损坏几个滚轮吧。

而我那个朋友和那群作家的努力“奔跑”，会不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大的危害？目前，我还不敢轻易下定论。但如果一定要说它们有益，看来也非常勉为其难。至少前者增耗单位的电费和后者浪费国家的纸张，那是确凿无疑的。

当然，也有危害巨大的。纳粹党魁希特勒“从不承认疲劳，坚持不懈地工作”，甚至因此“视力下降”、“长期失眠”。可他这样“奔跑”的结果是什么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使大约三千五百万丧生了性命。

所以，从“奔跑”这件事上，我们还得有所警觉，不是所有的“奔跑”，都有益于社会，也不能因为对方在“奔跑”，就不假思索地予以肯定——这对仓鼠是如此，对我的朋友是如此，对那群写手是如此，对希特勒之流更应如此。

当代生活

公交车众生相

○林椿

最近一年多来，天天往杭州城西跑，去女儿家管外孙女，于是公交车几乎天天坐，坐多了，公交车上相看不得不少，今天也拿来议议聊聊。

我坐的公交连线浙大玉泉校区和紫金港校区，不少乘客是大学生和教职员，当然也有操三墩口音的慈眉善目的大妈大伯及抱在他们怀里的小孩，也有形象粗犷的打工者，也有年轻的公司白领等。大约是读书人多吧，此趟公交秩序良好，绝少争抢座位之类，老人上车，年轻人主动让座。一时间，“谢谢”、“不客气”、“你请坐”充盈于耳，其中夹杂着余杭方言，牙牙童语，温馨满车厢。

但是并非公交不文明行为就此绝迹，以我一年多来的观察体验，车上吃东西的有之，言语粗俗、大声喧哗的有之，衣冠不整、赤膊上车的也有之（极少数），而最多的是大声武气、旁若无人打手机的人。此类人打手机，短的五六分钟，长的十几二十分钟，有的车都到终点了，他们还在喋喋不休，令人不堪忍受。

细分这类人，又可分出这几类：一是高谈阔论型。此类人说什么话题，都是“高屋建瓴”的，很有“首长”味道。例如：“今天雾霾很大，都有200多啦，不过嘛，治雾霾要从你我做起，办法总比困难多……”细辨这些话，都属于广播和电视

上的翻版，属十分正确的废话。

二是开会作指示型。这些人年纪约30~40岁左右，外貌精明强悍，通话中尽说些你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。例如：“那个客户是怎么跑掉的，你必须说清楚，马上采取措施追回来。”激动时，音调提得很高，伴以种种手势。

三是打情骂俏型。打情骂俏很正常，是生活的调味品，但一般应压低嗓门，说悄悄话的。若是一妙龄女子，嗓门大些秀一下感情，莺莺燕燕之音听着也算是一种享受，怕的是那些大叔大伯级别的老男人，捏起嗓门撒娇：“不要这样么，我是很想你的……”这真让我汗毛直竖，直到下车才平复。

四是手机吵架型。这些人把车厢当作自家客厅或公司办公室，手机打着打着吵起架来。有些吵着吵着，“啪”一下关机，倒也万事大吉，就怕少数人越吵越凶，使我辈如坐针毡。

都说咱中国人爱大声说话，爱表现自己，这也无大错，咱们慢慢改。社会竞争激烈，谋生不易，也都理解。但公交或地铁毕竟是公共场所，大声打手机，扰了别人，自身也遭白眼。苦思数日，想出一句口号来：“塑造车厢文明，从小声打手机做起！”公交或地铁如觉着合用，无偿奉献。